

全球化时代的

汉语意识

何九盈 著



语文出版社

全球化时代的汉语意识

何九盈 著

QUANQIUHUASHIDAIDE
HANYUYISHI

 语文出版社

· 北 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全球化时代的汉语意识 / 何九盈著. — 北京: 语文出版社, 201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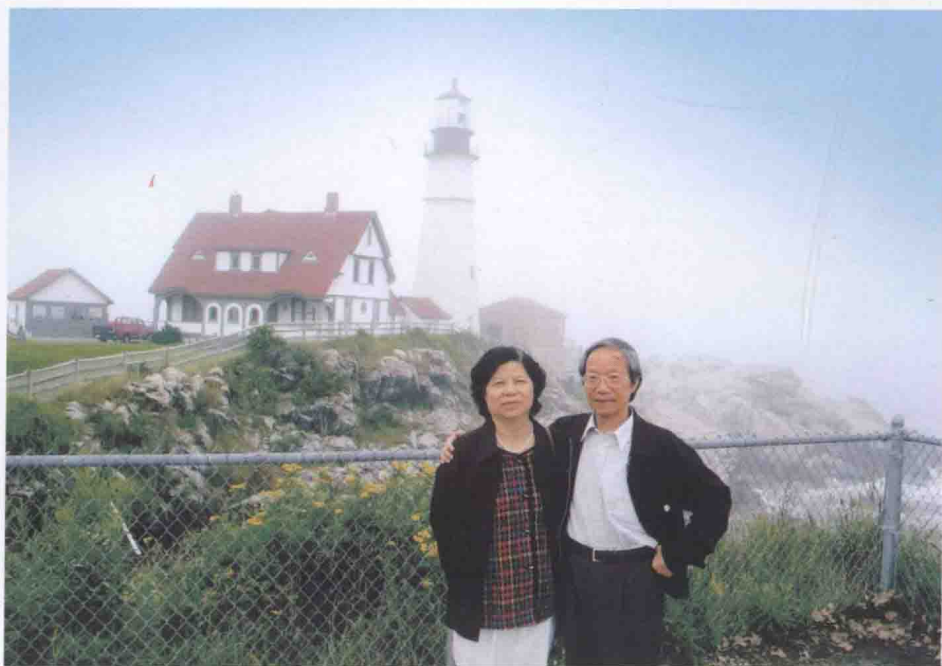
ISBN 978-7-80241-835-6

I. ①全… II. ①何… III. ①汉语—研究 IV.
①H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65927号

责任编辑	南保顺
装帧设计	梁明
出版	 语文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南小街51号 100010
电子信箱	ywcbasywp@163.com
排版	语文出版社照排室
印刷装订	北京市兆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发行	语文出版社 新华书店经销
规格	890mm×1240mm
开本	A5
印张	6.75 1插页
字数	154千字
版次	2015年8月第1版
印次	2015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
定价	20.00元

 010-65253954(咨询) 010-65251033(购书) 010-65250075(印装质量)



何九盈·李学敏参观美东波尔兰德古灯塔

题 辞

在古稀之年，我曾将自己的学术生涯总结为三句话：

永远要以振兴中华学术为己任；
要敢于向时间老人（或曰历史老人）挑战；
要全心全意热爱自己的冷板凳。

录自何九思《语言丛稿·自序》

2015年 5月

出版说明

此书为我社 2007 年出版的《汉语三论》一书的一部分。征得作者同意，《汉语三论》一书分编为两本，一本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语文转向》（外一种），一本为《全球化时代的汉语意识》，仍由我社出版。原书前的《几点说明》和书末的《后记》，谨遵作者之意，一仍其旧，同时收录。

本社编辑部

2015 年 5 月 20 日

几点说明

一、这是三篇在内容上相对独立的论文，旨在研究现代汉语书面语的历史，普通话的历史，汉语如何走上世界等问题。这三大问题互有联系，故合为一书，名曰《汉语三论》。

二、《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语文转向》一文，在定稿过程中，邵永海、杨荣祥两位先生曾提出宝贵意见。

三、2004年2月我应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和社会科学学院院长丁邦新教授邀请，赴该院访问，曾以《转向》一文演讲。丁邦新、张洪年、孙景涛、张敏、朱晓农、杨荣祥、张军等先生，不吝赐教。此后，又应澳门大学中文系主任宋绍年教授邀请，以此题作为学术演讲，听讲同学及邓骏捷等先生亦有赐教。

四、2004年2月24日，我应邀赴香港大学中文系作学术演讲，从《全球化时代的汉语意识》一文摘取部分内容，题为《母语与现代民族》作为讲词。承系主任单周尧教授、李敬忠教授和于昕先生及多位同学不吝赐教。

五、这三篇论文从构思、写作到定稿，历时近四年。每立一论，必有多种材料为据，而大量资料均属新购，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项目的资助，为此课题的完成提供了重要保证。

六、对以上提到的给予本课题以各种各样帮助的单位或个人，在此一并深表感谢。

何九盈

2005年9月4日

目 录

壹、问题的提出	(1)
一、什么是全球化	(2)
二、什么是汉语意识	(14)
三、全球化与汉语意识之间有什么关系	(18)
贰、母语意识	(22)
一、母语意识是近代民族的产物	(22)
二、台湾的两次母语危机	(55)
三、海外华人的母语意识	(66)
四、大陆内地的母语意识	(76)
叁、传播意识	(98)
一、语言的两种身份	(99)
二、汉语传播意识的发展过程	(105)
三、传教士与汉语传播	(125)
肆、民主意识	(177)
一、为什么要对语言讲民主	(177)
二、语言民主意识的两个层面	(187)
伍、规范意识 (略)	(196)
参考文献	(197)
2007 年版后记	(201)
2015 年版后记	(205)

提要：

“全球化时代的汉语意识”问题，是从未研究过的新课题。面对全球化，汉语应该有什么样的意识，才能走向世界，参与国际语言竞争，这是新时期提出的新任务。本文根据国内外的语言经验，尤其是欧美（法、德、美、俄等）的语言经验和近现代中国的语言经验，提出了一个初步理论框架，认为汉语意识应包括母语意识、传播意识、民主意识、规范意识等内容。

母语意识与传播意识相辅相成，民主意识与规范意识相辅相成。四者缺一不可。

本文重点探讨前两种意识，这在当前有很重要的实践意义。至于民主意识，虽很重要，但经验不多，论述只能是粗线条的。规范意识，一向很明确，论者已不少，本文从略。

壹、问题的提出

什么是全球化？什么是汉语意识？全球化与汉语意识之间有什么关系？

我提出的这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已有不少研究，二、三两个问题乃本文首次提出，当然也就无人研究过。

一、什么是全球化

迄今为止，什么是全球化，还没有一个公认的标准定义。可事实上，“全球化”已成为一个颇为时髦的名词。我们要研究现代化进程中的语文转向问题，就无法绕过这个名词，也可以说是无法绕过这个事实。

据李慎之（1923—2003）讲，他“是九十年代初在中国第一个提出全球化的人，当时响应者寥寥。不过九年，现在是人人都谈全球化了”。^①

李慎之把“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一四九二年哥伦布远航美洲，东西两半球因而汇合而开始的。……不过在九十年代以前，还没有人这样认识。因此我称之为‘没有被认识到的全球化’。九十年代开始，也就是哥伦布发现美洲五百年以后，全球化已成为人们的共识，因此我称之为‘被认识到的全球化’”。^②

李慎之还认为：“全球化将是一个没有终结的过程，而且我们有理由乐观地期望全球化最终会给全人类带来永久的和平与无穷的福利。”^③又说：“全球化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但我看达到这一结果必须要有五百年、甚至一千年的时间。”^④

也有完全相反的意见。英国牛津大学的阿兰·鲁格曼在《全球化的终结》一书中，认为“全球化只是一个神话，它从来没有

① 李慎之：《全球化将是一个没有终结的过程》，见乐黛云，[法]李比雄主编《跨文化对话》（2），29页，上海文化出版社，1999。

② 同上书，31页。

③ 同上。

④ 同上书，3页。

真正发生过”。^① 他的口号是“忘掉全球化”。^②

我是大体上赞同李慎之的。不管人们愿意还是不愿意，“全球化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经济利益的驱动，国际商贸的驱动，文化交流的驱动，的确不可逆转。任何一个国家，如果自外于全球化，等待它的就是被别人“化”掉。全球化的实质就是全球现代化，全球经济一体化。不在于你喜欢不喜欢，也不在于你愿意不愿意。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你愿意也罢，不愿意也罢，全球化是肯定要实现的。如何迎接全球化，如何在全球化进程中夺取机遇，这才是正道理。

毫无疑问，整个全球化过程不可能是一个和平礼让的欢乐过程，而是一个充满竞争、充满矛盾、充满文争武斗的复杂过程，是一个为时数百年、上千年的渐进过程。

以往数百余年的全球化已经走了三步棋。东西方不约而同地向海洋挺进，终于发现新大陆，环球航海成功，揭开全球化大序幕，这是第一步棋，是改写人类历史最伟大的一步棋。

1492年，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奉西班牙国王之命，携带致中国皇帝的国书，以为从欧洲向西航行就可以到达东方，结果发现了美洲新大陆。后人把这一年作为世界全球化的起点。

1497年，葡萄牙人达·伽马从里斯本出发远航印度，第二年来到印度西海岸卡利库特，成为欧洲第一位开通由大西洋至印度航线的航海家。

1510年，葡萄牙驻印总督亚伯奎占领印度果阿，1511年葡萄

① [英] 阿兰·鲁格曼、常志霄，等，译，《全球化的终结》，1页，三联书店，2001。

② 同上书，22页。

牙人用武力侵占马六甲。从此，果阿和马六甲就成为殖民者向东方挺进的两个据点。

出生于葡萄牙的麦哲伦参加过占领果阿和对马六甲的战争。后入西班牙国籍，并于1519年率西班牙船队，历时三年，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环球航行，麦哲伦本人在与菲律宾土著的战斗中，被岛民击毙。

1543年，相当于中国明代嘉靖二十二年，中国的文化精英还在四书五经中摸爬滚打、还在叩拜先师孔圣人时，而在近代世界史上，这是极为重要的一年，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1473—1543）的《天体运行论》出版，比利时医学家维萨里（又译为韦尔撒鲁斯、维塞留斯，1514—1564）的七册《人体结构》于巴塞尔出版。他们对“天体”“人体”的研究成果引起了人类宇宙观、世界观的深刻革命。所以，人们认为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始于1543年。

全球化与近代化几乎密不可分。近代化促进了全球化，全球化又加深了近代化。

全球化与近代化是海洋文明的胜利，是近代自然科学技术的胜利，是中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所夺取的胜利，是西方文明压倒东方文明的胜利。从16世纪开始，东方成为西方的掠夺对象，整个东方基本上沦为西方国家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只有日本例外。日本也曾闭关锁国，1853年（中国咸丰三年）美国海军军官佩里（Perry，1794—1858）率舰队强行驶入浦贺港，1854年陈兵东京（江户）湾，迫使日本签订《神奈川条约》，日本同意开放下田、函馆两港，并同意美国在下田设立领事馆。从此，日本走上了“脱亚归欧”的变革之路，一度称霸东亚，而最终“日本是唯一

诺诺地屈服在西方的一个最大强国的军事占领之下”。^①

汤因比在研究中日“西方化运动”进程时有“日本兔子和中国乌龟”^②这样的比喻。这个比喻跟龟兔赛跑的故事无关。“中国乌龟”向海洋展示国威，不仅远远早于“日本兔子”，也早于哥伦布将近100年。这就是人所共知的1405年开始的三保太监下西洋的故事，郑和七下西洋可证明初的国力和航海技术均雄居世界第一，中国已具备海洋大国的技术条件。然而，郑和似乎只是为航海而航海，既无哥伦布、麦哲伦那样的目的，又未取得伽马、佩里那样的效果。而且，后来的统治者再也没有永乐皇帝那样的雄心，视海洋为禁地，视西欧为“蛮夷”，龟缩在国门之内，完全不知道海洋对中国的生存有何等重要的意义。而世界并未忘记中国，西方资产阶级朝思暮想要敲开中国的铁门。如1793年、1816年英国两次派出使团出访中国。但乾嘉二帝完全不知道国际社会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也不知道中国自身正隐藏着巨大的危机，更不知道当务之急，必须放眼世界，走改革自救之路，否则，只有一天天烂下去，自取灭亡。所谓“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这是真理。中国是一个幅员广大、文化历史悠久的大国，腐烂是一个极为漫长的过程，新生也是一个极为漫长的过程。烧了圆明园，还有颐和园，清王朝还可苟延残喘。汤因比曾将1853年美国佩里将军叩关日本与1793年英国马戛尔尼出访北京相提并论。他说：

1853年海军少将柏利（即佩里）的舰队出现于日本

① [英] 汤因比，曹未风，等，译，《历史研究》（下），22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② 同上。

领海后的 15 年内，他们不仅推翻了那个未能临机而起的德川氏政权（盈按：从 1853 年到 1868 年为 15 年。日本明治天皇在倒幕军的支持下，推翻德川幕府，改元明治），而且他们也完成了一个远为艰苦的任务，即代之而建立了一个能够自上而下地推行全面西方化运动的新政权。中国则用了 118 年的时间（盈按：指 1793 年至 1911 年辛亥革命）才完成了这一任务的小一半。1793 年马戛尔尼（即马戛尔尼）勋爵使节团之到达北京，和 60 年后海军少将柏利的舰队之到达江户湾一样，是西方的增强了的力量的一次证明；然而在中国，直到 1911 年，旧制度的推翻还没有随之而来，并且以后取而代之的，不是一个有效能的西方化新秩序，而是国民党在一个世纪的四分之一时间内（1923—1948）未能克服的一种无政府状态，而当时这种所谓自由主义的西方化运动是由它掌握的。^①

汤因比是站在西方立场来观察中国的，他的标准是东方的“西方化运动”，而我们的标准是近代化（现代化）、全球化。清王朝是现代化、全球化的障碍，1949 年以前的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政府同样是现代化的障碍。汤因比的意见是对的。这里的根本原因是中国未能产生占优势的中产阶级。在中国，商人始终没有政治地位，所谓全球化、现代化，如果没有工业、商业推动，只靠农民，是绝对“化”不起来的。俄国的彼得一世，日本的明治维

^① [英] 汤因比，曹未风，等，译，《历史研究》（下），220、221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新都造就了大批中产阶级，国力也随之富强。汤因比认为：“近代”的实质就是中产阶级。他说：

从我们现已描述过的接触的比较中得出的最有意义的结论是：把“近代西方文明”这一专门名词中的“近代”一词解释为“中产阶级”，“近代”一词就可以得到一个更为精确而具体的内涵。西方社会集团一旦产生了一个能够变成社会中占优势因素的资产阶级，它就已变成为“近代的”了。我们以开始于十五世纪末的西方史的新的一章为“近代的”，是因为就在那个时候，在比较先进的西方社会集团中，中产阶级已经开始进行控制了。^①

中国的“近代”比西方晚了好几百年，中国的“中产阶级”至今未占优势。“中产阶级”是否就等于“资产阶级”，西方的“中产阶级”是否就等于中国的“中产阶级”，似乎不能画等号。这个问题很有探究的必要，而这不是本书的任务。总之，中国在全球化第一步棋中处于闭关自守状态中，失去了走向世界的大好时机，这跟中国当时的社会性质、阶级结构有根本关系。

全球化的第二步棋是欧洲资产阶级君临天下，挟枪炮兵舰之威和科学技术之巧，在东方残酷推行殖民主义。除日本外，东方各民族大遭其殃。中国的现代化两次被日本摧残。甲午战争和抗日战争，中国受的损失不堪言状，中国的“中产阶级”无法登上历史舞台。

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和世界性的民族解放运动，全球终于创建了

① [英] 汤因比、曹未风，等，译，《历史研究》（下），22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联合国”。各民族的命运与“世界”命运不得不联系在一起。这期间，许多弱小语言消失了，国际性语言进一步形成，竞争也越来越激烈。

在全球化的第二步棋局中，中国由败转胜，汉语也由弱变强。尽管“中产阶级”还很软弱，而阻碍中国社会发展的蒋介石政权被赶出了大陆，中国初步赢得了棋局上的主动权。

第三步棋始于20世纪末年。全球经济一体化，信息时代的到来，世界两大对抗阵营的趋同，冷战的结束，导致全球化的速度大大加快，前景也越来越明确。

一代又一代人在创造“全球化”，而历史并没有明确预先昭告人类，这就是“全球化”。中国人在全球化进程中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也获得了再生与再造的机缘。在今后的全球化进程中，中国人承担的责任将是史无前例的，汉语传播的责任也由此而产生。在这里，我们先讲点历史材料，可证“全球化”的思想和中国人应如何对待全球化的问题，百余年前的思想家就已经有不少论述了，以王韬（1828—1897）为例。

我以为王韬是最早研究“全球化”的中国人。他的著作中还根本不可能出现“全球化”这个词，可他的思想认识确已达到了至少是接近了这个境界。他对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对整个地球会产生什么重大影响已有相当清楚的认识。他的《哥伦布赞》说：

“获从古未获之地，开历来未有之局，名著地球，功在寰宇，惟哥伦布以当之而无愧矣。”^①

^① 王韬：《哥伦布赞》，见《万国公报》42册，1892年7月，第20本，12929页。转引自王林《西学与变法》，53页，齐鲁书社，2004。

所谓“历来未有之局”，就是一个全球化新时代开始了，所以“功在寰宇”。

在《弢园文录外编》中有关“全球化”的思想表述得相当充分：

1. “今日欧洲诸国日臻强盛，智慧之士造火轮舟车以通同洲异洲诸国，东西两半球足迹几无不遍，穷岛异民几无不至，合一之机将兆于此。……故泰西诸国今日所挟以凌侮我中国者，皆后世圣人有作，所取以混同万国之法物也。”^①

盈按：王韬说的“合一”“混同”就有“全球化”的意思。他是那个时代最具世界眼光、最具独立思考能力的知识分子。“东西两半球”的沟通，“火轮舟车”的制造，即新的地理发现和新的交通工具的产生，为“合一”“混同”创造了条件。但王韬毕竟是秀才出身，所以还是寄希望于“后世圣人”。

2. “故吾向者曾谓数百年之后，道必大同。盖天既合地球之南朔东西而归于一统，亦必化天下诸教之异同而归于一源。”^②

盈按：王韬说的“道”还是孔夫子那一套。他说：“夫孔子之道，人道也。人类不尽，其道不变。三纲五伦，生人之物已具，能尽乎人之分所当为，乃可无憾。圣贤之学，需自此基。”^③“天下诸教”都归于“孔子之道”，身处清朝末年的弱势中国，能发此惊世之论，真需要有极大的理论勇气和深远的世界目光。据报道，1988年1月当时的法国总统密特朗召集75位诺贝尔奖得主在巴黎开会，会上物理学诺贝尔奖得主阿尔文博士的发言中

①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原道》，2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

②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变法上》，10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

③ 同上。